

学术与随笔

物象之美 · 人文之情 · 历史之脉

——读汪泉《湘子桥畔》兼及潮州文化史

曾 恬 张丽军

摘 要：地方情感史作为历史文化散文的一个深邃而丰富的维度，不仅是对历史事件和文化景观的记录，更是对特定地域内人们情感、记忆、认同与归属感的深刻表达。汪泉《湘子桥畔》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通过“行走”兼“考古”的大散文笔调，辅以“戏剧编排”和“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讲述了潮汕人民从古代至近现代中国革命时期，再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打造、输出、再造潮州传统文化的过程，勾勒出潮汕地区的地方文化史、情感史与生命史，体现了潮州文化的物象之美、人文之情和历史之脉。这种心读式的人文书写诗意地还原了历史在具体文化语境中的真相，是展现千年古城文脉、挖掘岭南地区文化资源的文化实践，也是重现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汪泉；《湘子桥畔》；历史文化散文；地域文化；潮汕文化史

中华文化是由各地域的文化组成的。中国各地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构成了形态各异、丰富灿烂而又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①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湾区共同的文化根脉。它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地域特色，还蕴含着独特的价值观和卓越品质。^②近代岭南文化展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精神，重视从实际出发，既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又自觉学习西方文明的长处。这种文化的民族性坚守、时代性变革以及世界性激荡，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潮州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文化资源不仅代表了岭南地区的文化身份，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和传承岭南

文化，可以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书写潮州文化史，是展现千年古城文脉的当代文化实践。

岭南著名作家、编辑汪泉先生的《湘子桥畔》恰恰以其深情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潮州文化的生动人文历史画卷，成为潮州历史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汪泉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大散文的笔调，以湘子桥为潮汕文化的核心象征，讲述了潮州人民从古代至近现代

① 项久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陈平原：《弘扬岭南文化一定要有大格局》，《中国民族博览》2022年第8期。

中国革命时期,再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打造、输出、再造潮州传统文化的过程,暗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潮州文化的重要论述。^①作品体现了潮州文化的物象之美、人文之情、历史之脉,在书写的过程中彰显了潮州地方历史文化和人民的精神品质,体现了潮汕地区的地方文化史、情感史与生命史,是重现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举措。

一、物象之美：地方文化史的呈现

早在2020年,汪泉就与《潮州传》作者黄国钦先生、广东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钟晓毅先生一起踏访过潮州。在黄国钦先生的带领下,他们拜访了学者李炳炎、画家吴维湖、手拉壶非遗传承人吴锦全、潮州颐园馆长陈伟明、麦秆画大师方志伟、潮绣大师孙庆先、木雕大师辜柳希等人,行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住在潮州的载阳大厝,为此次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023年4月,为了该书的写作,汪泉再次亲赴潮州进行采访与调研。在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蔡少敏等人的协助下,他获得了珍贵资料,并在《潮州日报》副总编辑林桢武先生的支持下,得以顺利进行采访。汪泉再一次通过行走的方式感受着潮州古今之变,体悟着潮州人的烟火日常。他行走于湘子桥、黄利行、陈慈黉故居、天后宫、关帝庙、从熙公祠等历史遗迹,又走过“四永一升平”^②、放鸡山,跋涉在历史与山水之间,呼吸着其中散发出来的历史气息。汪泉以“行走”兼“考古”的写作手法,书写潮州的人文风情与历史遗迹,以达到追溯地方文化根源和历史脉络的效果,增强读者对文本所书写的地方文化史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湘子桥横跨韩江,连接东西两岸,以其独特的“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结合形式闻名遐迩,被形容为“形断意连,似无实有,断续灵动,如有神助”^③。这种独特的桥梁设计,不仅在结构上展现出一种虚实相间的美感,更在视觉上形成一种流动与变化,仿佛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完美结合。桥上的石梁坚固耐用,特别选用了石盐木作为架梁的巨木,这种木材坚硬如铁,且能抵御白蚁侵蚀,确保了桥梁的持久稳固。汪

泉站在湘子桥上,看见了它身上所承载的千年记忆。湘子桥在文本中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色彩。它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更是渡人渡己的象征。曾汪等官员在韩江边沉思,最终决定架桥以造福百姓,这种为民情怀和家国担当,使得湘子桥成为一座寄托情感和精神的家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湘子桥经历了多次修缮和变迁。元朝时期,湘子桥在大德二年(1298)和大德十年(1306)分别由总管大中怡里和常元德主持修缮,但规模均不大。元泰定三年(1326),判官买住曾尝试将桥上木梁换成石板,但由于施工经验不足,仅完成了4孔,随后又接连断折3孔,导致溺亡事故,最终不得不重新换回木梁。元至正四年(1344),府判乔贤对全桥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维修,并在桥头重建了仰韩阁,同时更改了桥名,统称全桥为“济川桥”,不再使用“康济桥”或分段所沿用的旧名称。这些修缮和更名不仅是对桥梁本身的维护,也是对当地文化和历史的传承与尊重。明永乐、宣德年间,湘子桥再次遭受洪水侵袭,桥墩被冲垮,桥梁断绝。面对如此严重的损毁,人们无不痛惜,担心这座古桥从此消失。然而,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的工程技术,湘子桥最终得以重建,并继续承载着连接两岸、沟通往来的重要使命。当作者行走在湘子桥上时,不仅可以感受到古桥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历史底蕴,还能体会到古代工匠的匠心独运和卓越技艺,每一步都仿佛踏入历史长河,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那份古老而神秘的气息中。

望着这条曾经汇聚着红头船、自东向西蜿蜒流淌的韩江,汪泉走向樟林古港南社的港墘巷,来到黄利行遗址,这是由红头船主陈宣衣所开创的。原建筑物现仅存四级台阶,那四级坚硬的石阶尽头是空洞的。汪泉说:“蹲下身子,或者俯身下去,再看,那石阶似乎通向了时光的另一

① 陈凯星、叶前、毛鑫:《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 工夫潮州:延续千年文脉 古今相得益彰》,新华网, 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8/13/c_1129800754.htm, 2023年8月13日。

② 指的是永兴街、永泰路、永和街、永安街、升平路。

③ 汪泉:《湘子桥畔》,第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面:那些暗藏在光影交错中的声音和味道,以及幢幢帆影,似被岁月尘封,像一个未曾开启的梦境,却又清晰无比。侧耳细听,这四级台阶上尚且回荡着主人公陈宣衣不屈的跫音,还有红头船劈风破浪的呼啸声;闭目深嗅,尚可闻到海腥味夹杂着油漆味。”^①汪泉在历史遗迹中的“行走”,并非简单的“走马观花”,而是对潮州历史文化精神脉搏的深刻倾听。乘红头船“下南洋”的潮汕人,必不可少地需要祈求妈祖的庇佑,天后宫与关帝庙便是他们远行前必去之地。潮汕的天后宫众多,最早的天后宫位于放鸡山,在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樟林古港口东,天后宫又称“亥爷宫”。据传,当年林君之母在携子改嫁时,频频遭遇“黑猪”的阻挠,改嫁未遂,林君才决定出海经商。林君事业有成后,林母称:“你今天的发达全凭妈祖保佑和猪爷的帮衬,要学会感恩。”于是,林君便在北社建立天后宫,供奉妈祖,并在妈祖神像前面的右侧,专门制作黑猪泥塑造型一同供奉。猪在十二生肖中对应“亥”,当地人雅称黑猪为“亥爷”。樟林至今流传着一句俗语:亥爷得饭妈祖福。

在众多的庙堂中,潮安区彩塘镇金砂乡的从熙公祠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据载,从熙公祠是该村“资政第”大型建筑群落的中心所在,整个建筑群修建耗时十四年(1870—1884),耗资26万银圆。整座建筑为潮汕特色的“驷马拖车”建筑样式,配有南北龙虎门,正中座为丛熙公祠,坐西向东,中间为天井,两边回廊,后有拜亭,建筑布局超出了一般的“四点金”规格。这种布局和风格体现了潮汕地区传统民居的独特韵味。最吸引人的是镶嵌于从熙公祠门楼石壁上的四块镂空彩色石雕。整座建筑的石雕、木雕、嵌瓷工艺精湛,尤其是石雕艺术更是驰名,被誉为石雕一绝,体现了潮州人民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拜亭下雕刻有名为“戒贪”的图案,其中有一似龙、似狮、似麒麟的动物,传说它贪心成性,见什么吃什么,最终精疲力竭,淹死于东海。这个图案主要寓意是告诫人们凡事不能太过绝对,不要太贪心。从熙公祠可谓一步一景,各景均呈现出清代旅居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华侨领袖和实业家陈旭年的故土情结和实干信念。

“空间是历史的产物”^②,作者只有通过“行

走”与“考古”,追溯潮汕的历史遗迹,在特定空间中进行近距离的审美观照与远距离的历史考察,才能真正触摸到潮汕文化的历史脉络和精神脉搏,捕捉到历史遗落在潮汕文化中的生动细节。历史遗迹所呈现的物象之美,不仅代表了潮汕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的文化生命与文化身份,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

二、人文之情：地方情感史的呈现

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并非仅仅为了展示作者对历史典故的广泛了解,而是通过重新解读和阐释历史,力求在字里行间与古人的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对话。这种创作方式要求作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历史知识基础,更需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以便能够穿越时空的界限,真正理解古人的生活状态、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湘子桥畔》以“湘子桥”为线索,结构安排精巧,各个章节紧密关联,形成了一个“自南宋至新时代”的完整叙述体系,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时空框架。在这个时空中,有古代潮州官人的“以民为本”,有“过番客”的团结奋进,有潮籍侨胞的家国担当,亦有潮州手工艺人的守正创新。湘子桥,这座横跨韩江的古老桥梁,不仅是一条物理上的通途,更是中国历代文人精神追求的象征。它“形断意连,似无实有,断续灵动,如有神助”^③,恰似文人墨客笔下那些看似破碎却又紧密相连的情感世界。汪泉以史为线,以情为珠,串联起一部地方情感史,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汪泉在书写湘子桥的形成过程中,描绘了曾汪这位步入晚年的官员形象,他以韩愈为榜样,立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初到潮州,面对韩江涨潮时两岸百姓难以渡江的困境,深感痛心,于是决心架桥以渡人渡己。“渡人渡己”,这四个字镌刻在曾汪心中,不仅化作其建桥渡江

①③ 汪泉:《湘子桥畔》,第71、1页。

②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Ltd., 1991, p.26.

的实际行动,更是他人人生信条的深刻诠释。他站在轩窗之侧,遥望韩江,思考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这种“渡”的情怀,超越了个人得失,是对家国天下的深情厚谊,也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索。这种以民为本、心系苍生的情怀,是中国历代文人共有的价值取向。曾汪建桥拉开了历任潮州官员建桥的序幕,在此后五十七年中,先后有九位州官主持,在湘子桥畔赓续造桥。他们不仅关注国家的兴衰存亡,更关注普通百姓的生计和福祉,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民为贵”的思想。他们深知,只有建起一座更加坚固、宽阔的韩江之桥,才能真正解决百姓的渡江之难,也才能在自己的仕途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对历史的尊重与对未来的憧憬,正是中国历代文人共有的精神特质。湘子桥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多位官员和工匠的共同努力,不断尝试、屡败屡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面对江面宽阔、水流湍急等自然条件的挑战,展现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例如,孙叔谨在增筑西桥石洲时,吸取前任失败的教训,详察水文、水流变化,最终实现对江面宽度的合理分配,使得康济桥的格局得以定型。从曾汪到孙叔谨等历任官员,他们不远千里从福建来到潮州,将此地视为第二故乡,不仅因为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更缘于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为老百姓谋福祉,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情怀超越了个人私利,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

正因有历代潮州前贤的精神文化滋养,潮州人在往后的历史长河中,方才能于内有团结奋进、守卫家国、正本清源的民族情怀,于外有落地生根、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担当气魄。汪泉通过书写八百多年间众多贤达士子、历任官员和千千万万潮州人齐心协力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塑造出一种具有历史感的叙事话语,将孤立的个人话语汇聚为充满力量感的集体话语,使得湘子桥“渡人渡己”这一意涵具有更深层的价值指向。这种历史之美,让湘子桥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实体,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记录着潮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正如路文彬所说,历史重写行为,

也恰是出于集体共同性认证的急切动机。^①汪泉重新书写了这段历史,展现了中国历代文人的生命情感的缩影,他们或忧国忧民,或寄情山水,或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与美好。这种讲演历史的形式,实际上“隐含着个人融入集体公共空间的冲动”^②。在湘子桥上漫步或驻足观赏时,人们不仅能感受到其独特的建筑美学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更能深刻体会到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从而达到“共情”的审美效果。共情是“人类情感经历和社会交互的重要成分,是指通过观看或者想象能够感知、理解他人的处境,能对他人的处境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并对导致这种情绪状态的来源有清楚认识的一种能力”^③。汪泉通过对历史事件、人物和文化的重新解读,试图揭示那些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真相,挖掘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智慧,从而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读者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鲜活,体会到古人的情感与精神。这种深刻阔大的、绵延接续的人文之情,是湘子桥物象之美的核心所在,也是其对地方情感史的呈现。

“公共情感并非流于空洞的政治理念或一般的政治原则,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生成情境中。”^④通过这种历史的重写,读者在沉浸性的历史叙述情境中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审美体验,从而与故事人物之间建构了情感认同的关系,使得历史的连续性得以延展,这也是对集体记忆的一种重塑和传承。陈平原在谈及潮汕文化时说:“当务之急是寻找潮汕人的共同记忆,建立合理的历史论述与未来想象。”^⑤汪泉以国家为支点,立足潮汕特定的历史情境,建构出具有时代性、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国家叙事,涵盖了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对历史的敬畏、对传统的坚守以及对未来的期

①② 路文彬:《个人与国家的叙事抵牾——1950年代中国革命史的另一讲述》,《江汉论坛》2017年第9期。

③ 付迪、戚艳艳、伍海燕、刘勋:《共情与反共情的整合机制》,《科学通报》2017年第22期。

④ 孔凡芳、王强:《情感共同体:叙事认同视域下的阅读秩序建构》,《编辑之友》2023年第12期。

⑤ 陈平原:《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潮商》2016年第3期。

许,同时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地域认同与归属感的强化、情感表达的多样性与深度,以及现实关怀与未来展望等多个方面融汇起来。这种地域性与国族性情感在散文中得以积淀和传承,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人与集体的精神纽带。

三、历史之脉：地方生命史的呈现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除了人们对历史的文字记载之外,留下的就只有那些存于世间的历史遗迹。《湘子桥畔》对湘子桥、红头船和天后宫等历史遗迹的书写,实际上是对文化传承、社会变迁和历史记忆载体的书写,它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湘子桥上的红头船,见证了潮汕人民下南洋的迁徙史,天后宫和关帝庙又呈现了侨批的文化史,它们作为物象本身,构成了一种历史、生命与文化的传承。这实际上是通过“物史”建构出潮汕文化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国际汉学家饶宗颐先生说:“潮汕文化若干特殊现象,已不仅是地方性那样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①因此,如何通过书写历史遗迹来建构潮汕生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是该书作者用心追问和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

在《湘子桥畔》中,汪泉承袭了余秋雨在散文中演绎剧情的写作手法。他如同一位导演,将历史以“讲故事”的形式徐徐展开,用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出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剧情中演绎历史。在《红头船,烈焰在海面燃烧》中,作者开篇便道出多年后杨琳的心声:“他尚未预料到这条路将要把潮州的星火播撒到中国之外的诸多国度,进而像一股味道、一种声音、一个颜色一般,带着他们特殊文化的种子播撒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一年,十载……等到这些声音归来,这些颜色不变,这些声音愈发响亮的时候,世界方才醒悟。”^②这表现出潮汕红头船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潮汕人民的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每一艘红头船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个村落甚至一个地区的期盼。在历史人物的故事讲述下,历史的样貌逐渐清晰。红头船,以其醒目的红色船头闻名,象征着潮汕人民对未知世

界的勇敢探索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起初是用于沿海地区的运输和贸易。红头船独特的设计使其能够在风浪中保持稳定,船头涂成红色,既有祈求平安的寓意,也使其在海上显得醒目,便于识别。下南洋,指的是潮汕人及其他地区华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大规模向东南亚各国迁徙的历史现象。这一迁徙潮主要发生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当时国内战乱频发,自然灾害严重,大量民众生活困苦,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寻找生路。

汪泉运用抒情的叙述风格,在讲述民间故事的过程中通过细腻的描写真挚地表达了对南下潮汕人历史与命运的忧思和关怀。“有人死了,死在了船上,只会像一件破旧的行李一样,被扔进大海,葬身鱼腹。余有进和活着的人一样,悲伤如辽阔的海水,在晃悠;被扔进大海的尸体,在洋面上旋即被大小鱼类吞噬。”^③这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乘船下海的“过番客”跌跌撞撞的一生,让人不禁思考:“这些南下潮汕人的归宿在何处?”答案是:“天尽头,何处有坟丘?”^④一艘艘红头船,如同海面上燃烧的烈焰,不仅照亮了迁徙的道路,也点燃了潮汕人心中的希望之火。这些船只不仅承载了人的迁徙,还携带了大量的货物和文化,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每一段航行都是一次冒险,也是一次成长。在险恶环境下坚挺过来的人们,必有一番作为。红头船的故事,记录了潮汕人民在海上拼搏的历程,体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比如在《在异邦安顿灵魂》中,作者开篇便描绘了18岁的余有进登上下南洋的红头船时的模样,“他随身行囊中除了‘过番三宝’之外,比别人多了几卷古籍。唯有他,没有悲伤,没有哀愁,他淡然坐于船头,像一个行者,又像一个旁观者,他看了又看满船唉声叹气的同行者,打开了泛黄的书卷”^⑤,刻画出一个沉着冷静的“过番客”形象,为后续余有进在新加坡打造商业帝国,组织潮州人社团,建立第一

① 吴奎信:《近年来的潮汕文化研究》,《寻根》1998年第4期。

②③④⑤ 汪泉:《湘子桥畔》,第50、166、170、164页。

个潮州人庙宇,建“义山”让客死他乡者灵魂有归所,建立华人学校扶持后代的事迹进行了铺垫。这样“讲故事”的写作手法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潮汕人民“下南洋”的迁徙史,也由此呈现出华人宗亲文化形成的历史。身处异国他乡,生存不易,形成一个组织共同应对生活困难是华人的生存策略。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均建有大量的义山。马来西亚的义山组织很发达,许多义山归属于宗亲会管理。彼时的宗亲会旨在敦睦宗族,扶危救困。^①此外,如余有进等有识华人还重视文化教育,他们很早就设置私塾开展华文教育,并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开始较大规模地推行现代学堂教育。在华侨华人经济实力较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华校的发展很迅速。正如书中所描绘的:“那些竖排的汉字摆置在了异国他乡的学校里,一些本土的孩子羡慕不已,哭着闹着也要去上华人的学校,汉字便从他们口中诵出并得以传播,新加坡的街头传来孩子们的琅琅书声,汉语像音乐一样被唱响,人们开始了汉语交流,中国文化像一种特殊的香气,弥漫他邦。化物无形,润物无声。中华文明得以传播。”^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潮州人”等华人世界里广泛传播。“潮州人”等广泛参与的宗亲会肩负起传承文化和传统的使命,积极推动华语华文的保存及其与当地文化的交融。

倘若各章节的故事均采用“戏剧编排”的手法,会导致整本著作似成为“作者驾轻就熟的戏剧编排”^③,也容易让读者感到审美疲劳。书中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仿佛是按照特定历史发展轨迹所推演,透出“主题先行”的痕迹。因此,汪泉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不仅擅长使用“戏剧编排”法,而且擅长“以小见大”,从细节处窥视宏大的历史。在勾勒潮汕人民“下南洋”这段充满艰辛与奋斗的历程时,汪泉便以“老妈宫的眼神”为引子,通过“侨批”这一微观物件展现出潮汕人民那段充满苦难与希望、离别与重逢、漂泊与归依的宏观史程。老妈宫始建于清代,是潮汕地区供奉妈祖的庙宇。妈祖是海神,被海上行船的渔民和商人奉为保护神。这座位于汕头港畔的古老庙宇,自其建立之日起,便成

为渔民和商贾出海前祈求平安与财富的圣地。老妈宫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场所,更是离别与重逢的见证之地,许多潮汕人出海前都会到老妈宫祈求平安,归来时又到此地还愿。因此,老妈宫见证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潮汕人下南洋谋生的历史。汪泉以“老妈宫的眼神”为牵引点,描绘了潮汕人民为何“下南洋”,如何“下南洋”,“下南洋”以后处境如何的情形。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随着西方对工业品的倾销以及对原材料的掠夺,大量潮汕人口被西方劳工贩子通过拐骗、绑架等手段贩运到美洲、非洲,这个过程被称为“贩猪仔”。其中也有自愿前往者,被称为“契约华工”。据《“猪仔”华工访问录》载,“猪仔”被骗到“客行”后,要经过录口供(回答“是否自愿卖身”“父母是否同意”等问题)、验身(体检)、签约(签订卖身契约)、照相这一系列流程。办理完买卖手续,买主要给卖身者一笔“卖身银”,即“安家费”。有一些“猪仔”会转变为“水客”,即成为贩运货物的行商。水客中也有黑话,其中往返于汕头与各乡村之间的水客,叫作“吃淡水”,赚取少许的钱;往返于汕头和南洋之间的水客,叫作“溜粗水”,赚的钱多一点。他们按照批款额的3%~5%向寄批人收取手续费,这又被称为“贴水”。^④“猪仔”贸易在汕头持续了五六十年,直至1912年孙中山发布《令广东都督严禁贩卖“猪仔”文》《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后方才有所收敛。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口岸契约华工出口基本告一段落。

在“下南洋”的过程中,侨批成为连接海外华人与故乡的“银信合一”的特殊文化载体。书中通过对侨批的描绘,展示了侨批在潮汕文化中的重要性。作者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生动的比喻,例如,在描述雁阵一般的侨批时,作者运用细腻的笔触描绘

① 张锋:《东南亚华人宗亲文化与宗祠建筑特色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② 汪泉:《湘子桥畔》,第172页。

③ 栾梅健:《余秋雨对当代散文文体的拓展及其局限》,《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

④ 刘玉遵等编:《“猪仔”华工访问录》,第1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了侨民在外生活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潮人像一股又一股的洪流,随着海潮,浩浩汤汤,奔向东南亚。他们节衣缩食,以血肉之躯换来一点点微薄的银两,以不变不易的对家园的持守,将这些血汗钱随着一封封‘平安批’寄回到故土的那个逼仄矮小的厝屋,维系着家小安顺吉祥”^①,将侨批在亲情和家国的脉管里迂回往返的辛酸血泪落于纸笔,反映了潮汕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家庭的深厚感情。从审美层次来看,书中的遣词造句都浸润着艺术想象的激情和对历史的思考,充满了浓郁的诗意色彩和抒情风格,增强了读者的共鸣。

侨批的运输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最早的批局是汕头市澄海区东湖乡的致成批局,是由新加坡著名华侨黄继英设立的。当年,致成批局在新加坡开业之后,黄继英协同族亲黄松亭回汕头创办汕头的首家侨批局“森峰号”。后来,黄松亭又协同魏福罗创办揭阳“森峰启记”批局,也就是后来的魏启峰批局。在致成批局倒闭后,潮阳县(今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简朴乡的“水客”李阿梅意识到必须壮大侨批事业,于是开始临时雇佣“批脚”,协助分发侨批。1874年,他与马阿隆、马秋圣在暹罗(今泰国)与潮阳县成田乡创立了当地最早的同名批局“永和丰银信局”。两地批局互动,像跨国银行一般。侨批业繁盛的背后是大量潮汕移民的涌入。清乾隆年间,潮汕人已在他们的侨居地形成颇具规模的潮汕人居住区,潮汕华侨社会在东南亚各地已逐步形成。而在潮汕地区,也初步出现了与南洋潮汕人息息相关的侨乡。

总之,在《湘子桥畔》中,湘子桥上的红头船承载着潮汕人民“下南洋”的迁徙史,而天后宫和关帝庙则承载着侨批的文化史。这些物象本身不仅构成了历史、生命与文化的传承,更是通过“物史”的方式,勾勒出潮汕地区乃至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汪泉正是通过“历史演绎”和“细节品鉴”的艺术手法,促使历史遗迹在书写的过程中达到建构潮汕生命史的高度。

结语

历史文化散文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叩问,

也是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地方情感史,是文学作品中一个深邃而丰富的维度。它不仅是对历史事件和文化景观的简单记录,更是对特定地域内人们情感、记忆、认同与归属感的深刻表达。这种地方情感史,通过散文的笔触得以细腻呈现,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湘子桥畔》作为一部历史文化散文,既有对历史的客观记述,又有对文化的深情赞美和眷恋。它以物象为筋骨、人文为血脉、历史为魂魄,细腻地勾勒出潮州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从物象的角度来看,汪泉以“行走”兼“考古”的写作手法精写潮州的历史遗迹,以“物”追根寻脉,重塑潮汕地域文化史;就人文的角度而言,汪泉以“湘子桥”为线,串联起数位前人那看似零散却又紧密相连的情感世界,在重塑集体记忆中建构地域情感共同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汪泉通过“戏剧编排”与“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重现潮汕地区的下南洋迁徙史和侨批文化史,试图建构出从近现代中国革命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时期的历史叙事,为阐释中国近现代史、当代史提供了另一重要视角和维度。

总而言之,汪泉将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悟寄托于细腻而轻盈的语词中,在淡淡的诗意中还原了历史在具体文化语境中的真相,使得《湘子桥畔》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之间达到了和谐统一,也使其成为一部兼具历史记录和文学欣赏价值的佳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21&ZD2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恬,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张丽军,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汪泉:《湘子桥畔》,第144页。